



2008年1月18日 星期五

精品文摘

第76期

编辑 孙明道

电话 67655582

E-mail:zzwbwh1616@sina.com

ZHENGZHOU DAILY SPECIAL COLLECTION

17

而中国人脏乱差的心病积压多年,以至于一旦经济繁荣了,就大洗狂洗起来。当今很多城市居民,每天多次洗澡,又费水又费皮,不染上洁癖不罢休。

## 清洁高雅轮流转

很多人都想当然地以为,中国在卫生方面自古就落后于西方,动不动就拿西方的例子来侮辱中国。这种印象一是来自西方的影视作品——干净的城市,整洁的男女,二是来自中国的令人遗憾的现实——污浊的城市,邋遢的男女。但其实摆脱这种错位比较,整体上看,中国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比西方要洁净和讲究。

西方古代,洗澡是比较稀罕的事情。古希腊的沐浴,不是为了清洁身体而是为了锻炼身体。只有在罗马帝国的时候,公共浴室比较发达,但是却成为淫乱的场所,罗马最后毁灭于自己的腐败。一洗澡就淫乱,可见平时没有养成以平常心来看待洗澡的习惯。而中国很早就产生了清洁身体不同部位的专有词汇:沐、浴、洗、澡等,跟洗浴有关的情节频繁出现在史书和神话故事中。“沐浴更衣”早就成了日常词汇。

外交官就是文装军人,是用笔和舌打仗的。有时候,外交官要根据“战场”的不同情况,使用各种“秘密武器”来对付对手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后,土耳其不甘心受制于列强,向希腊发动进攻,一举将希腊击败。此举激起了英国的不满,英国遂联合法、意、美、俄等国派兵在瑞士的洛桑与土耳其谈判,企图迫使土耳其签订有关条约。

## 装聋

英国派出的外交大臣是克遵,其人最大的特点是声音洪亮;土耳其派出的代表是伊萨美,其人则有点耳聋。会谈开始后,克遵威胁的言辞像连珠炮一样向伊萨美压来,大有泰山压顶之势。等到克遵声色俱厉地叫嚷完了,各国代表都面对伊萨美看他做何表示时,他不

而中国很早就根据各地的条件和风俗,普及了马桶和蹲坑式厕所。至于贵族的如厕方式,看看《世说新语》,就足可想象了。

西方在受尽了肮脏之苦,病死了一半以上的人口以后,乃觉得公共卫生事业的重要,借助工业革命和侵略扩张抢去的黄金白银,开始普及现代卫生系统。1899年,波斯特尔发明了直落式坐便器。大量盥洗架的制造,使欧美人民习惯了每天洗脸——这项移风易俗之举,已经被有识之士呼吁了数百年。1916年后,由于陶瓷工业的突破,现代式样的浴盆开始大量生产,欧美人有了闲钱,有了闲工夫,有了闲欲望,终于感觉到洗澡之乐,于是后来居上,变成了“干净人”。

英国最早提到刷牙是在1651年,中国的清朝初年。伊丽莎白女王年轻时牙是黄的,晚年是黑的,比林黛玉和贾母她们落后多了。欧

慌不忙地张开右手靠在耳边,并将身子向克遵移动了一下,态度温和地问:“您刚才说什么?我一句也没听见。”克遵气得浑身直发抖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在以后的谈判中,伊萨美不时装聋作哑,对土耳其有利的话他都能听见,不利的他的话假装听不见。经过三个多月的谈判,英、法等国的无功而返。

摘自《旧闻》

ZHENGZHOU DAILY

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-mail:zzwbwh1616@sina.com

## 史树青：一生为国“捡漏”

鉴藏年少独名家

北京和平门外,全长约800米的琉璃厂曾是广集天下图书、字画、古玩、文房四宝的所在。上世纪初,年幼的史树青随父亲来到北京,此后,喜好书画的父亲就常常带着他逛琉璃厂。正是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,少年史树青逐渐走进了文物古玩的门槛并慢慢熬炼着自己的眼力。在这种熏陶中,史树青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知识的不足,恰好,当时北海公园的国学书院开始公开授课,学院邀请当时著名学者讲授课,史树青成为当年最年轻的学生。放学后他还是经常去逛琉璃厂并把捡漏儿买来的字画拿回学校,给张鸿来、孙照几位先生看。因为字画,先生们给他单独开辟了第二课堂。

有一次,张鸿来先生的朋友在琉璃厂淘到了一幅郑板桥的《竹石图》,顺路到北师大附中找张先生帮着鉴定一下。但张先生不能确定,其他几位先生也不能确定。犹疑中,张先生找来了史树青。年少的史树青接过画,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,语气坚定地說:“真的。”“你能确定?现在市面上仿郑板桥的赝品可不少啊。”“能确定。您看这画中的画笔、书法运用得流畅而无滞碍,这是真迹。我家里有郑板桥的字画,我认真琢磨过,我也读过郑板桥的书,我有经验。您看这年代也对得上。”先生们见他说得这样有底气,也就不再质疑下去,但鉴定书到底任凭经验,凭眼力,先生们还是建议买主拿到琉璃厂,找研究郑板桥书画的行家鉴定鉴定。行家看过后,确认是郑板桥的作品,从此,史树青在北师大附中,在琉璃厂就有了名气。

“几士居”里的鉴宝专家  
1952年,史树青捡到了一个生中最有历史价值的一个漏儿。一个熟人为了贴

补家用,要卖些旧书画,一幅成吉思汗的半身画像引起了史树青的特别注意。在史树青的记忆中,成吉思汗画像过去见世仅有一幅,还是明朝人仿制的;而这幅画中人物的服饰与《元史·舆服志》中的记载相吻合。虽然他当时不能一下子就确定这不是元朝的画作,但他觉得这幅画中肖像应该很接近真人相貌了。

史树青花几元钱买下了这幅旧画,然后就捐献给了历史博物馆。这幅画曾经过几次认真地鉴定,确定是画匠在成吉思汗去世之后凭着记忆绘画的,是元朝时期祭祀用的画像,应列为历史博物馆一级藏品。

这幅画像的发掘,不仅突破了博物馆成吉思汗的文物实品的零纪录,更有着广泛的社会价值,它作为现存最早的成吉思汗画像被广为引用,中小学的教科书中也总是拿它作为重要插图。

1965年12月,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把古剑,该剑出土时寒光闪烁,纹饰清晰精美,通体无锈迹,震惊考古界。郭沫若、于省吾、商承祚、史树青等专家汇聚湖北,破解古剑密码,确认为越王勾践的王者之剑,即“越王勾践剑”,并且被专家称为“天下第一剑”。时年41岁的史树青是当时与会最年轻的专家。

尽管前辈予以了肯定,但史树青自己却总是觉得读书不够,他的书斋取名为“几士居”,意思是:大约能算个读书人吧。年过八旬的他觉得最大的憾事是“此生读书少,垂垂老矣,愧对师长”。

生性率真假作假

鼓励友人捐国宝是史树青的一大乐事,他鼓动同学和他一起买来饭摊上的青花大盘,转手捐给了故宫博物院,被领导藏家将无意购来的古画捐给国家,甚至

还专门劝小贩,把未砚卖给博物馆。几十年来他通过这种方式为博物馆搜罗到的宝贝不计其数。

史先生生性谦和,待人宽厚,几十年来鲜有与人角,只除了一件事——作假。他的妻子夏老师回忆说:“史先生对于假货深恶痛绝,只要看见就必然要究。有时候电视里播放一些涉及文物的案件,不管是电影还是纪录片,史先生必仔仔细细看。不过他关注的不是什么情节,而是古玩真假,发现是假的,他就会指着电视大叫‘那是个假的,那是个假的。’有时甚至还要和电视吵架。”从这种孩子气的举动里,史老不容虚假的个性可见一斑。

有一次,一名香港富商请史先生鉴定一字字画,尽管每一张字画都很完美,但经验丰富的史先生还是看出了破绽。对于这样的结果,香港人并不满意,他找到史先生的夫人,表示这批字画已经找好了买家,价格也都已谈妥。只要史先生肯为字画题跋,证实东西是真的,他愿意将所得的1/3或者一半分与史先生。

一直陪伴史先生,见证了鉴定全过程的夏老师回绝称:“您的藏品确实是真假参半,如果史先生没有鉴定出假货,是他的眼力不够;如果他故意把假的说成是真的,那么是作伪证。无论是作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副主任,还是一个做了几十年鉴定的读书人,这种事一次都不能做。”事后史先生对夏老师说:“你说的就是我要说的。”

无论是在嘉士德的拍卖预展上,还是在天津的旧货市场里,只要看见假货,史先生总要大声说出自己的看法。因为这种率直,他被请上了拍卖会,也曾被旧货摊主叫骂,更有人深夜打

来电话,威胁他管住自己的舌头,而史先生依然故我。2005年4月初的一天,史树青来到北京大钟寺文物市场淘宝,在一个地摊前,他发现一把青铜剑颇为“眼熟”,辨认出剑身两行八个文字,史树青暗吃一惊——这八个字为“越王勾践自作用剑”,文字是春秋战国时期吴、越的鸟篆体,而且是错金的。“有价值!”心中有数的史树青花1800元钱把这把古剑买了回来。然后,他将这把剑捐给了国家博物馆。

不料过了几天,博物馆将剑退给了史树青,理由是:专家认为作假的。一生痛恨作假的史树青居然献了一把假货,学界开始躁动起来,加上媒体的助阵,一时间各种观点和质疑在史先生的头上。

被史家收藏的这把越王勾践剑,剑柄处饰有12圈同心圆,剑镡两面分别嵌有青金石和绿松石,剑身一面遍布菱形暗纹,一面篆有“越王勾践自作用剑”八个鸟形文。打开郭沫若主编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》画册,从样式到造型,眼前的这把剑与上世纪60年代出土的那把“天下第一剑”一般无二。对于这把剑的归属,夏老师表示,还是要等学术界有一个明确结论后再定,否则,这也是对故去的史先生的不敬。

史老曾为此写了一首诗:“越王勾践破吴剑,鸟篆两行字错金。得自冷摊欲献主,卞和到老忠是心。半夜难眠时,不知史先生是否手抚着清冷的剑身,回忆起当年与郭沫若、于省吾诸大师生共同鉴定的盛景,回忆起那个风华正茂、挥斥方遒的年代。如今,当年参与鉴定的师友都已辞世,文玩之风虽成显学,却已离离学术越来越远了,他这一颗到老的忠心,却又有谁能懂呢?”

摘自《先锋国家历史》

晚清名士梁启超来到江夏(今武昌)讲学,按规矩礼节性地拜访了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。谈话之中,张之洞出了一副对联,请梁启超对下联。张之洞的上联是:“四水江第一,四时夏第二,老夫居江夏,谁是第一?谁是第二?”

张之洞这上联的意思是说,在江淮河汉四水里,长江名列第一;在春夏秋冬四季中,夏天排在第二;我在江夏坐镇,你来江夏讲学,“谁是第一,谁是第

二”呢?要与一位地方军政长官争第一,比高下,看你一介书生哪来这个胆量!你不敢,自然就屈居“第二”,甘拜下风了。

梁启超的下联是:“三教儒在前,三才人在后,小子本儒人,岂敢在前?岂敢在前?”这下联的意思:“三教”指儒、释、道,儒家排名在前;“三才”指天、地、人,

如今不少德国人向往失业。尼诺女士就是 I 认识的一位向往失业并已实现这一愿望的德国人。她还有一个中国名字叫“钟雯”。这是她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汉语时用的名字。这位已有两个孩子的妈妈,1994年离婚后一直在波恩的一家三星级酒店工作。前不久,却突然提出辞职,理由是不适应那份工作。“其实,我是在找借口失业。失业了会享受比工资更丰厚的福利。”她说,“我上班时,每月工资2000马克,比我两个孩子的福利金还少800马克,这工资中还要上缴70马克的税费,最后剩下的只有我两个孩子的福利金的一半。而我失业之后,虽然没有工资,但每月领到相当于原工资总额67%的失业补助金。同时,还可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,既自由,又可创收。”她所说的“自己喜欢的事”,其实就是做中国人的导游。她辞去旅馆工作不久,经在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工作的一位校友牵线,在中资企业某旅游公司专为来欧洲的中国公务考察团做向导服务。这种雇佣关系虽然是松散式的,但每陪一个团的收入却是不菲。除旅游公司按天支付工资外,考察团还得视团员多少按当地规矩为其支付小费,小费按天支付,每天30至100美元不等。除此之外,如果她所服务的考察团的团员在旅游商场

处在家庭和社会中,有时候恐怕需要讲点容忍。

唐朝有一个姓张的大官,家庭和睦,皇帝远扬,一直传到了皇帝的耳中。名帝赞他治家有道,问他道在何处,他一口气写了一百个“忍”字。这说得非常清楚,家庭中要互相容忍,才能和睦。这个故事非常有名。在旧社会,新年贴春联,只要门上写着“百忍家声”就知道这家人一定姓张。中国姓张的全以祖先的容忍为荣。

但是容忍并不容易。1935年,我乘西伯利亚铁路的车经苏联赴德国,车过中苏边界上的满洲里,停车四小时,由苏联海关检查行李。这是无可厚非的,入关必须检查,这是世界公例。但是,当时的苏联大概认为,我们这一帮人想到另一个资本主义

## 难分第一

人居于后;我是个读书人,怎么敢在你之前?但是“三教儒在前”,我又“岂敢在后”呢?对联对了,话回了,柔中带刚,不卑不亢,维护了读书人应有的尊严。

南齐王僧虔,是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四世族孙,也练就一手好书法。有一天,齐太祖萧道成提出要王僧虔比试书技。于

## 德国人向往失业

买了东西,她还可得商场付给的数目不小的一笔回扣。这一系列的进账都不需上税。因为是松散式用工,没有履行用工登记手续,所以她的失业补助金仍照领不误。

在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,恐怕没有人不认为失业是一种不幸。而在德国,工薪阶层的人已形成这样的共识,“失业是福。”尼诺女士说,这并不是就业观念和价值观念的问题,而是政府的福利政策和税务政策的“引导”。上班拿工资的人以各种名目的税、费为社会做贡献,尤其是东西德统一以后,不仅税赋更高,而且,每月还要从每个人工资中扣除2%作为扶持东德地区的专项基金。现在的税费总额几乎占每月工资的1/3。而不工作的人却可以靠福利过得很滋润,有的人拿着丰厚的各类救济金旅游度假,甚至周游世界;还有为数不少的人凭着上大学免费的政策,竟十年八年地在大学里进行“再教育”。

钟雯说,她中学的一位同班同学至今还在海德堡大学读书,而她在北京上完大学都工作好几年了。钟雯抱怨说:“这样的社会分配机制,谁还愿意为生存而上班,谁又有必要为生存

## 以容忍为荣

国家去,恐怕没有好人,必须严查,以防万一。检查其他行李,我绝无意见。但是,在哈尔滨买的一把最粗糙的铁皮盒,却成了被检查的首要对象。这里敲敲,那里敲敲,薄薄的一层铁皮绝藏不下一颗炸弹,然而他却敲打不止。我真有点无法容忍,想要发火。我身旁有一位年长的老外,是与我们同车的,看到我的神态,在我身旁悄悄地说:“容忍是很大的美德。”我对他微笑,表示致谢,立即心平气和,天下太平。

看来容忍确是一件好事,甚至是一种美德。但是,我认为,也必须有一

是君臣二人各写楷书一幅。写好后,齐太祖要王僧虔评谁写得更好。

如果直截了当地说真话,是会冒犯皇上的;但是,如果对皇上说假话,也犯了“欺君上罪”。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?王僧虔是这样回皇上的:“臣的书法,人臣中第一;陛下的书法,皇帝中第一。”不仅书法,王僧虔的智慧也是第一流的!

摘自《中外文摘》

而上班呢?”

钟雯有位邻居叫莱米多,结婚十多年都没要孩子,怕养孩子麻烦。但没孩子就不能得到相关的福利,靠夫妇二人的工资,总觉得入不敷出。几年前,他们向政府当局申请,从孤儿院领养了一个孩子,由此每月获得的福利金比一个孩子的税后工资还多。为了获得更多的福利收入,夫妻二人又出演了一桩离婚案。在法官面前,夫妇唱随,一致强调非离不可。在财产分割方面,莱米多“发扬风格”,主动提出房产全部归女方。法官见二人都死心塌地要离婚,而财产方面双方又达成一致,只好照此判决。离婚后,夫妻生活却依然如旧。办离婚手续后的第二个月,莱米多如愿以偿地分到一套“社会房”(救济房)。他按事先的计划,将这套房私下转租出去,每月收房租近2000欧元,这笔收入相当于他们夫妻二人税后工资的总额。

本来,德国的许多福利项目都是有一定条件的,比如救济金是帮助那些“靠自己的收入和财产无法保障其基本生活的人”,失业补助金是帮助那些“在过去三年内至少工作过十二个月,并且一直在找工作的失业者”。但是,政府显然已搞不清哪些人不能保障基本生活,哪些失业者一直在找工作或已找到了工作。

摘自《中国社会报》

个限度。我们几个中国留学生相约:如果外国人侮辱了我们自身,我们要揣摩形势,要容忍,以东方的恕道克制自己。但是,如果我们侮辱我们的国家,则无论如何也要同他们玩命,这就是我们容忍的界限。幸亏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,否则我就活不到今天在这里拜拜罢了。”

现在我们中国人的容忍水平看了真让人气短。在公共汽车上,挤挤碰碰是常见的现象。如果碰了或者踩了别人,连忙说一声:“对不起!”就能够化干戈为玉帛,然而有不少人连“对不起”都不会说了。于是就相骂相骂,甚至于扭打,甚至打得头破血流。我在自己心中暗暗祝愿:容忍兮,归来!

摘自《重庆晚报》

## 名流故事

### 胡适眼中的勋章

卡毓方

这里说的是慈,更有严。1935年春,罗尔纲为《大公报》作书评《聊斋文集的稿本及其价值》,胡适读后,感到立论不够工稳,当面教训罗说:“你的话太武断了。一个人的判断代表他的见解,判断的不易,正如考证不易才站得住;就是,不要有臆障给人推翻。”又,1936年夏,罗尔纲在《中央日报》发表短文《清代士大夫好利风的由来》,胡适见后,非常生气,随即写了一封严厉的信责备:“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,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……你常作文,固是好训练,但文字不可轻作,太轻易了就流为‘滑’、流为‘苟且’。我近年教人,只有一句话:‘有几分证据,说几分话。’有一分证据只可以说一分话,有三分证据后可以说三分话。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,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。”

胡适对罗尔纲的栽培,是量身打造,一丝不苟的。罗尔纲在北大考古室,做了两年,还是助理。1936年春,机会来了:清华文学史学系主任教授蒋廷黻将出任驻苏联大使,蒋十分欣赏罗尔纲的才华,推荐他接任自己教授的中国近代史课。然而,出乎所有人的意外,胡适却不放罗尔纲去清华。罗尔纲大惑不解,对胡适也产生了离心,他在朋友的帮助下,又联系了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。一天,罗尔纲前住久未登门的胡府,打算作最后的告别。胡适恳切地对他说:“尔纲你生气了,你要知道,我不让你到清华去,为的是替你着想,中国近代史

## 你敢学习安徒生吗

生一直是别人的笑料。他朗读书时时候被邻居笑话,他写诗的时候被同学笑话,他把当地的一篇神话改编成《海的女儿》时,又被同行和媒体笑话。很显然,安徒生注意到了这些不太善意的反馈。尽管他也痛苦过,但并未因此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。三、主动接近名利巅峰的大人物。这一条简直就是安徒生的杀手锏,那绝不是一般人想得到做得

包括的部分很广,你现在只研究了太平天国一部分,如何去教人?何况蒋廷黻先生是个名教授,你初出教书如何就接到他的手?如果你在清华站不住,你还回得北大来吗?”稍停,胡适又说:“我现在为你着想,还是留北大好,两处都不要去。你到别的机关去,恐怕人家很难赏识你。”如此推心置腹,如此细致入微。听了胡适的解释,罗尔纲彻底明白了恩师的良苦用心。

胡适少年得志,名满天下,他的35个名誉博士学位,就是证明。但“名”这玩意,有用,也有限。举个例子,20世纪40年代,胡适担任美国政府驻美大使,其间送上门来的博士头衔,就有27个之多。而同是这个胡适,同是生活在美利坚,1949年后,只因他的身份大使沦为难民,那么多的博士证书也没能为他换来一个教席,最后只能在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谋一个中文部的管理员。胡适经此沧桑染病,愈加珍重昔日学生罗尔纲授予他的这枚特殊“勋章”——也就是《师门五年记》给他的温暖。罗尔纲此书写于1943年,仅三万字,因为种种变故,始终未能正式出版。1958年12月,胡适六十八岁生日前夕,他决计自掏腰包把它印刷出来,作为生日礼品,赠给前来贺寿的每一位客人。而在生命的最后一天,1962年2月24日,胡适宴请“中研院”院士时,也送了每位客人一本。那天,宴席刚散,胡适站在大堂送客,心脏病突发,猝然去世。呜呼,罗尔纲的《师门五年记》,遂成了胡适留给世人的最后的馈赠。

摘自《今晚报》

剧院伴唱的差事。并在不久后获得了一位大学校长的全额高等教育资助。

本来注定要进工厂做学徒的穷孩子,就这样一步步向上等人迈进。是,对我和我的朋友来说,这种耻辱感所带来的痛苦似乎比成功的荣耀感所带来的欢乐更大。所以我们至今仍在研究安徒生当时的心理状态,而安徒生早已走进了历史的圣殿,就连无意中资助过安徒生的那些人也已经过过回忆录了。

摘自《西安晚报》

谁谁谁

摘自《今晚报》

摘自《西安晚报》

摘自《今晚报》

摘自《今晚报》

摘自《今晚报》

摘自《今晚报》